

試論新博物館學與民族教育實踐的可能發展

文／圖·馬田（Amur）

新博物館學如何與原住民族教育實踐做結合？近期有機會參與幾次臺東地方論壇，主要是民間針對花東發展條例將挾注在臺東的資源進行討論，其中關於原住民議題的討論，多次涉及民族教育的問題，特別是學校（體制外）與部落（體制內）的連結，而引發我這個結合部落發展需求與新博物館學連結的想法。

雖然「原住民族教育法」法中明訂「民族教育」的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負有權責推動學校中的民族教育，但實質上教育部才是學校主管單位，原民會能夠介入的空間有限，導致「民族教育」在現行機制中，多為「點滴式」供給，如此邊緣化的發展自然無法論及原住民族的主體性。於是，突破現行體制內「片斷式」的族群文化教育，採以更具整合、且具實驗的性質，將特定區域內的有形、無形文化資產整合，並結合地方的歲時祭儀，營造成為實踐民族教育的土壤，深耕之種苗才能有茁壯的場域，而這樣的概念實具有「新博物館學」之內涵。

2011年，原民會著手規劃「實驗型第三學期民族學校」欲創造另一條現有教育體制之外的體系。2012年4月25日，原民會公告了阿美族、排灣族與卑南族民族學校的設立，這是政府首度以官方名義公告設立的學校，與部落或是個人自行辦理的營隊有所差異。畢業生可以獲得政府頒予之相關證書，可以說體制內的教育發展出另一條道路，企圖結合體制外教育的需求。姑且不論未來發展如何，此一政策的出現象徵民族教育已不再是體制外之事，部落有機會創造符合具主體價值的教育機制，當然這仍需許多實驗過程與實踐毅力。本文旨在提示關於「實驗型民族學校」的成立與「新博物館學」內涵中，所具有突破框架之開創精神，且在實踐中建構地方主體，似有置放在一起思索與運用的可能空間。

一、民族學校之理念、課程與教學特質

原住民族學校之設立是為傳承與振興原住民族歷史文化、體認與實踐原住民的價值認同，培養並發展原住民的潛在能力。本質上，原住民族學校本著原住民族主體發展的精神，以原住民之需求為依據，以民族傳統文化為核心內容，增進其民族自信心與認同感，在民族知識的傳承實踐創新的歷程中，厚植其參與現代社會之能力（陳枝烈，2012）。教學內容則涵括「族語暨文學」、「傳統生活技能」、「社會組織」、「藝術與樂舞」、「傳統信仰與祭儀」、「族群關係與部落歷史」、「部落倫理與禁忌」、「環境生態保育」等8項學習領域。其教材及課程、共同科目由原民會統籌，其餘則由各部落或各族群依照實際情況自行研發（李榮哲，2012）。

另外，民族教育課程的實施也有別於一般教育，主要依據以下五項特質來推動（陳枝烈，2012）：

1. 採統整課程精神。藉單一議題之延伸與擴展，進一步理解族群文化的整體性與連結關係，避免過度的分科教學。
2. 採螺旋式課程模式。隨著學生年級的增長，透過課程設計，學習內容將逐漸加深、加廣，以促成學生對文化的完整體驗。
3. 採用全族語教學，以提供學生學習環境，也更能理解符合文化本意的學習內容。
4. 配合歲時祭儀操作。學習內容多採以體驗式學習，應把握部落區域內重要的文化時間與祭儀，將課程融入其中，趨近生活化的學習。
5. 學習場所多元化。生活場所即文化場所，體驗式學習更需實地參與，部落裡每個角落都應作為教學的素材，讓部落的空間與時間皆成為民族教育之養份。

以上關於民族學校的發展理念與課程規劃，有許多部分都與當時臺東論壇有關民族教育改善之提議多處相似，而有些部落也早已推動相似的文化深耕工作。這讓筆者聯想到奇美部落「奇美就是一個博物館」之概念，部落以地方館（類博物館）作為整合傳統知識與文化再生產之基地，結合部落阿美族傳統年齡組織、家族作為能量網絡，善用當地之生態、人文環境，引

部落與博物館共同打造民族教育學習氛圍的體驗環境，能讓博物館參與在民族教育的實踐。奇美部落與奇美文物館共同辦理年齡階級體驗營即達到此一效果。（奇美部落吳明季提供）





奇美部落與奇美文物館辦理年齡階級體驗營，透過勞動學習感受部落的教育傳承。(奇美部落吳明季提供)

入部落社區營造的資源等，以積極實踐「生態博物館學」概念(吳明季, 2011)。而這座不在博物館裡的「博物館」，自然也成為奇美阿美族人落實自身民族教育最佳的場域，其案例點出了「新博物館學」對於民族教育可能帶來的助益，特別是「開放」與「自主」思維的引進。

二、新博物館概念的影響

哈里森(Julia Harrison)在1993年的文章裡，嘗試對過去傳統的博物館學概念做一番檢討與批判，認為新博物館的重心不再是典藏、研究、保存和展示等傳統功能為主，而是轉向於地方社群社會事件的關懷層面的課題上，也就是社區或地方的需要成為博物館經營的主要指導原則。

另外，華許凱文(Walsh Kevin)在1992年提到，「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的概念，基本上包含「生態博物館學」及「社區博物館學」兩方面的思考層次(Julia D.Harrison, 1993, 13(2):160-176, Walsh Kevin, 1992:轉引自張立伶, 1998)。也就是說，以上兩種博物館的類型，雖然名稱不同，但是因為基於相同的理念而能互相囊括。

(一) 生態博物館學 (eco-museology)

希賀微(George Henri Rivière)引介美國國家公園和社區博物館的觀念，主張將一個完整地域以博物館觀念來思考，將自然生態與歷史古蹟統合在現代人的生活中，整體展現出來，達到自然環境、歷史、古蹟保存與增進現代人生活整體環境目的(新井重三, 1990:44-46, 轉引自呂理政, 2002)。

於是，博物館開始介入地方社區的文化發展，在這期間的轉變扮演著媒介角色與功能，加上新博物館概念中強調社區組織的成立與自治，透過組織產生，推動居民形成共識，居民才得以重新對社區環境與生態有所關注。

希賀微在〈The Eco-museum: An Evolution Definition〉一文中提出對生態博物館演化型定義的看法(鄭秀嫻譯 1996, 10(1):3-6)：

生態博物館是一個保存中心，其目的在保存及發展地方族群的自然與文化資產；生態博物

館是一座學校，其目的在投入地方族群的研究與保護工作，並鼓勵能清楚地把握自己的未來。

「生態博物館」基本上是一種思考方式，對世界全面、開放的系統看法，其基本議題也在於對環境的敏感和生活品質的相關問題。換言之，在「新博物館學」的理念中，「生態博物館」的角色是主動的，它不單是對過去的整理，也關注於現在、更放眼於未來的發展。

(二) 社區博物館學 (community museology)

「社區」(community)這個概念源自於西方，指的是人們群聚生活，逐漸形成一個具明確邊界且各自獨立的村落，居住在其中的居民彼此都具有某一種程度依存關係，可能是血緣宗教或產業等，經過一定時間歷程，累積出屬於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以及可傳承的聚落文明及文化歷史等，可說是社區的原始雛形(陳明竺, 1993)。換言之，社區即是一個空間、一種網絡，更是集體認同的單元。

社區博物館的內涵，主要是透過居民的參與規劃，進而提供展品、場所，而使得整個社區的每個角落或是物件，皆可以是被展示甚至是重新被討論。對於這樣的發展，有學者提到將博物館傳統的形式捨棄，而將博物館概念用於一個地域中運作，透過居民的自主參與管理，建設出一個不抽離當代時空又能與自身文化脈絡相連結的展示場域。

然回顧1994年，從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一直到現在的「地方文化館計畫」，其發展思維可說皆有受「新博物館學」思潮影響。其著重於透過社區營造的過程，結合居民的參與，將不同類型的文化據點整合串連，統合出全面性的地方文化版圖，形塑「地方生活文化圈」。而「文化生活圈」的概念主要是希望能依照地區民眾所從事不同性質的文化活動所形成的空間區域，企圖結合不同文化元素，例如居民的參與、地方文化活動、生態環保、自然與歷史景觀和地方產業以及文化教育機構等，以達到整合地區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資產，進而滿足地區內民眾生活上關於文化各方面的需求(林慧如, 2008)。

試想，部落整體文化環境能有如此理想發展，不正好提供民族學校所欲落實之教學內涵及教學特質所需要之養份，而博物館不也可作為助益部落進行教學的其中環節，而將二者結合起來。

三、藉民族學校的發展作為新博物館學實踐的可能

綜觀「實驗型第三學期民族學校」與「新博物館學」之理念，不難發現其中許多發展可相互呼應與結合，例如在文化資產的整合與傳播教育上，特別是兩者所具備的「實驗」特質，更讓筆者關注，往往理念與意義能否與當代社會產生融合，實驗是驗證與創造未來的重要「實踐」。而這樣的基礎是可以作為「實驗型第三學期民族學校」與「新博物館學」產生連結的關鍵，似

乎鮮少有人從這樣的角度來談論。

國際博物館經營委員會（INTERCON）總裁大衛·佛萊明（David Fleming）於2009年接受《Museum Identity》期刊專訪時提到，博物館可以變成學校、社區中心，更可以是遊樂場、飯店，同時，人類可以想像的展示形式，從繪畫、攝影、戲劇、音樂、建築到舞蹈等，也都幾乎被渴望多元發展的博物館所嘗試過。可以說，19世紀以來固有、傳統的形式與思維，在後現代風潮影響下不斷被修正與挑戰¹。

一旦博物館可以轉變成任何需要的狀態，也意味著可以放棄，傳統博物館的功能與樣貌正面臨一種崩解的狀態，其意義也隨著不同時空中、不同力量的形塑而呈現出不同的社會意義。博物館之所以求新求變，基本上是反映後現代博物館歷史研究中，傾向多元主體的創造。面對如此充滿活力與實驗性的發展，其背後所主導的操縱思維，想必也正在積極創造更多樣的包容性，以符應社會轉變下所產生的多元價值。

然而，「實驗」的特質有助於博物館中新文化與舊傳統的交流，有助於博物館面對社會文化發展的前瞻性。「新博物館」的出現，是人們在各自所處的時空下不斷地實驗與學習，其理念就是經由這些過程所累積出來的，那是一種實踐的過程，並沒有特定的理論可循（曾婉琳，2007）。

然而，「實驗型第三學期民族學校」的實踐，對現有邊緣化的民族教育而言，也可算是另一種出路的找尋。在主流教育的縫隙下，藉由不斷的變形發展，以積極回應部落文化續存的需求以及主體性的確認。雖然目前選定發展民族學校之地區具有一定程度的族群文化內聚能量，而未來的發展更朝向高度整合區域內有形、無形文化資產以作為教育素材之外，更強調將素材轉化成民族教育深耕的養分。這必然關係到建構地方知識的能力，並進一步有效傳播以及影響地方，此發展牽涉到一定程度的專業分工以及跨領域的結合，才足以支撐高度整合的教育系統運作與品質需求。如果這是一個關鍵的維繫力量，而這個需求已經超越了地方部落的資源與發展思維時，筆者認為具關懷社會文化並提供保存、研究以及教育功能的博物館，在此時更積極彰顯自身的角色與意義，特別是以原住民文化為核心的博物館。

就如前述所提，面對現今開放性博物館的思維，博物館的發展已無法迴避當代社會的轉變，僅置身於對過去的再現。積極參與社會議題的研究與呈現，提供公眾論壇的空間，是博物館與當代社會重建多面相關係的方式，亦是博物館從中檢視自身定位的機會。而面對民族學校的出現，其理念與操作中傾向於區域博物化的發展，博物館確實有其介入參與的契機，且有其

適宜的高度可參與，以作為實踐新博物館學理念與社會責任的空間。

（本文作者為臺東縣海端鄉初來部落族人，曾任海端鄉原住民文物館駐館規劃員，為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

參考文獻

李榮哲

2012 〈實驗型第三學期制民族學校〉，原教界，第46期：頁6~7。

呂理政

2002 《博物館展示的傳統與展望》，臺北：南天。

吳明季

2011 〈物的力量—從奇美文物回奇美到恢復失傳祭典儀式〉，《臺灣博物館季刊》30(2)頁14~19。

林慧如

2008 《地方博物館政策研究：以英國地區文藝復興計畫為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明竺

1993 《街區組織》，臺北：藝術家。

陳枝烈

2012 〈第三學期制民族學校課程設計理念〉，原教界，第46期：頁18~19。

張立伶

1998 《生態博物館與地方文化發展之研究：以蘭陽地方為例》，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婉琳

2007 《地方文化館的依賴發展：一個反身式的思考》，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論文。

George Henri Rivière著，鄭秀嫻譯

1996 〈生態博物館：演化型定義〉，《博物館學期刊》10(1)頁3~6。

¹ 出自2011年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學術研討會「十字路上的博物館——博物館研究學術研討會」徵稿前言。